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

陳寅恪

許雨新先生國霖以所輯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來徵序於寅恪，寅恪受而讀之，以爲敦煌寫本之有題記者不止佛教經典，而佛教經典之有題記者此編所收亦尙未盡，然即取此編所收諸卷題記之著有年月地名者與南北朝隋唐之史事一參究之，其關繫當時政治之變遷及佛教之情況者，約有二事，可得而言：一則足供證明，一則僅資談助，請分別陳之。

此編所收寫經題記之著有年號者，上起西晉，下迄北宋，前後幾七百年，而其中屬於楊隋一朝及唐高宗武則天時代者，以比例計之，最居高位。隋書卷五十五經籍志佛經類總序通鑑卷一百一十五陳宣帝紀太建十三年條同。云：

開皇元年高祖普詔天下，任聽出家，仍令計口出家，營造經像，而京師及相州洛州等諸大都邑之處並官寫一切經，置於寺內，而又別寫藏於祕閣。天下之人從風而靡，競相景慕，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案，楊氏有國不及四十年，而此編所收寫經題之著有開皇仁壽大業之年號者凡三十有六種，故知史氏謂當時民間佛經多於六經數十百倍，實非誇大之詞，李唐開國，高祖太宗頗不崇佛，唐代佛教之盛，始於高宗之世，此與武則天之母氏家世信仰有關，武周革命時，嘗藉佛教教義以證明其政治上特殊之地位，蓋武曌以女身而爲帝王，開中國有史以來未有之創局，實爲吾國政治史中一大公案，寅恪昔已詳論，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五本拙著武曌與佛教。茲不復贅。今觀是編所收寫經題記著有唐高宗武則天之年號者若是之衆，亦可徵當時佛教之盛，所謂足供證明者是也。

又是編所收寫經題記其著有中國南方地名或南朝年號者，前後七百年間僅得六卷，

敦煌本古逸經論章疏並古寫經目錄尙載有天監十一年寫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爲此編所未收，吳越錢氏捨入西關磚塔之寶篋印陀羅尼經實出現在南方，不應與其他西北出土諸經並列，故不置論。又是編所收尙有其他西北諸地如吐峪溝等所出經卷，若嚴格論之，亦非「敦煌石室」一名所能概括，然則是編之題「敦煌石室寫經」者，蓋就其主要部分北平圖書館所藏者言之耳。恐讀者誤會，特爲申明其義於此。除南齊武帝永明元年所書之佛說普賢經一卷外，此編誤題爲妙法蓮華經。其餘諸卷皆書於梁武帝之世，而其中天監五年所寫之大涅槃經特著明造於荊州。論者謂永明之世佛教甚盛，梁武尤崇內法，而江左篇章之盛亦無踰梁時，見廣弘明集卷阮孝緒七錄序。則齊梁時代寫經必多。南朝寫經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會，流入北地，其事固不足異。又後梁爲西魏周隋之附庸者三十餘載，荊州之地既在北朝西部統屬之下如是之久，則南朝寫經之因以輾轉流入西北，亦非甚難也。寅恪以爲此說雖是，然猶有未能盡解釋者，蓋如論者之說，南朝所寫諸經既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會，流入北地，又經後梁屬境轉至西北，亦非難事，則南朝帝王年號之在梁武以後者，與夫隋唐統一時代南方郡邑之名何以幾全不見於此編所收寫經題記之中？是編惟仁壽元年所寫攝論疏有辰州崇敬寺之語，可指爲隋代南方地名之題記，但此題記殘缺不完，尙有疑義，亦未能斷定也。夫陳及隋唐中國南方佛教依然興盛，其所寫經卷竟不因通常南北交通之會流至西北，是何故耶？且後梁君臨荊土三十餘載，祖孫三世佛教信仰未嘗少替，則其封內所寫佛經自應不尠，何以其三世之年號此編有天保一年所寫妙法蓮華經一卷，當是北齊之天保非後梁之天保也。與其封內地名連文者，亦不於此編少留跡象耶？由此觀之，恐尙別有其故也。茲姑妄作一假設，以解釋之。續高僧傳壹壹吉藏傳云：

王晉王，即隋煬帝。又於京師置日嚴寺，別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輦，道俗雲奔。中略。在昔陳隋廢興，江陰凌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於三間堂內，及乎定後，方洮簡之，故目學之廣，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

又同書壹陸僧實傳云：

逮太祖宇文泰。平梁荊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至京。以真諦妙

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疏通，即爲披抉，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

廣弘明集 貳 隋煬帝寶臺經藏願文云：

至尊隋文帝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陳之日，道俗無虧，而東南愚民餘潛相煽，爰受廟略，重清海濱，役不勞師，以時寧復。深慮靈像尊經多同煨燼，結髮繩墨湮滅溝渠，是以遠命衆軍，隨方收聚，未及朞月，輕舟總至。乃命學司，依名次錄，並延道場義府，覃思證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類，莊嚴修葺，其舊惟新，寶臺四藏將十萬軸。因發弘誓，永事流通，仍書願文，悉連卷後。頻屬朝覲，著功始畢，今止寶臺正藏，親躬受持，其次藏以下，則慧日法雲道場，日嚴弘善靈刹，此外京都寺塔，諸方精舍，而梵宮互有大小，僧徒亦各衆寡，並隨經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懇至，受者亦宜殷勤，長存法本，遠布達摩，必欲傳文，來入寺寫，勿使零落，兩失無作。

隋書 卷 煬帝紀上云：

（開皇）八年，冬大舉伐陳，以上爲行軍元帥，及陳平，中略。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繼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都。詳見隋書 貳 高祖紀下及肆 楊素傳等。

案，南北朝政治雖爲分隔對立，而文化則互相交流影響，佛教經典之由私人往來攜取由南入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頗多，不勞舉證。但此類由南朝輸入北國之佛經，若在平時，僅經一二私人攜取或收聚，其數量不能不遭限制，蓋有資力及交通法禁等困難也。故衆多數量之收聚及輸送其事常與南北朝政治之變遷有關，如吉藏因陳亡之際，得大收經卷，其後入京，則所洮簡之南朝精本當亦隨之入北，五十餘蜀僧各懷經部北至長安，使僧實得通南朝佛教之新義，此二例雖爲私人之收聚及輸送，然非值南北朝政治之變遷，則難以致此。至若隋煬帝因江南高智慧等之亂，悉收南朝之經卷，而輸之北方，其措施非私人資力之所能，且與南北朝政治之變遷有關，固不待言也。

據此，可知南朝經卷之輸入北方其數量較多者，如吉藏之所收，隋煬之所藏，皆在陳亡之後，故其中至少有寫在陳時及造於吳地者，又歷李唐一代迄於北宋，更四百年，其間佛教流行既南北相同，則南方寫經之數量亦應不大異於北土，而今檢

此編題記，其有南方地名或南朝年號者，僅南齊武帝永明之一卷梁武帝時之五卷及尚有疑義不易斷定之隋仁壽時辰州崇敬寺所寫一卷而已。是敦煌經卷之寫於南朝或南方者當非復吉藏蜀僧及隋煬所收送之餘，恐亦無李唐五代北宋時南方所造者在也。

夫經卷較多數量之自南入北，既如前述大抵由南北朝政治變遷所致，而敦煌寫經題記之著有南朝年號或南方地名者，除仁壽時辰州所寫一卷尚有疑義未易斷定，可以不論外，則又俱屬於齊梁之世，依此二點，故頗疑天監五年造於荊州之一卷及其他寫於齊梁時之諸卷乃梁元帝承聖三年江陵陷沒時北朝將士虜獲之戰利品，後復隨凱旋之軍以北歸者。考西魏所遣攻梁諸大將中惟楊忠即後來隋之太祖武元皇帝，其人最爲信佛。詳見拙著武曩與佛教中楊隋皇室之佛教信仰條周書壹玖楊忠傳北史壹壹隋本紀略同。云：

及于謹伐江陵，忠爲前軍，屯江津，遏其走路。中略。及江陵平，朝廷立蕭詧爲梁王。中略。（保定）四年乃拜總管涇州寅恪案幽當依趙明誠金石錄貳貳普六茹思恭諸跋作幽。及靈雲鹽顯六州諸軍事涇州刺史。中略。天和三年以疾還京師。據此，西魏之取江陵，楊忠既參預其事，後又爲涇州總管，居西北之地凡五歲之久，則此梁武之世荊州寫造之佛典殆爲楊忠當日隨軍所收，因而攜往西北，遂散在人間，流傳至於今日，按諸舊史，徵以遺編，或亦有可能耶？此則未得確證，姑作假設，以供他日解決問題之參考，所謂僅資談助者是也。足供證明者別見他篇，可不詳論，僅資談助者聊書於此，以寄遐想而已。若此僅資談助之假設而竟爲史實也，則此編所收南朝數卷之佛典者，蓋當年江陵圍城之內蕭七符拔劍擊柱文武道盡之時，不隨十四萬卷圖書而灰飛煙滅者，是誠可幸可珍，而又可哀者矣！嘗謂釋迦氏之教其生天成佛諸奧義殊非凡鄙淺識所能窺測，今此寫經題記竟得以殘闕之餘，編輯搜羅成於一人之手，頗與內典歷劫因緣之說若相冥會，然則貝多葉中果有真實之語，可以信受不疑者歟？質之雨新先生，以爲何如？